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田漢專集（下）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
編

三、田汉1931年—1949年

剧作评介

田汉的剧作(节录)

陈瘦竹

在这时期，尤其是在一九三二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后，田汉的思想和艺术有了新的发展，正象他后来所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对人民疾苦和民族命运不断的关心”^①，因而在创作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在一九三一年初作《年夜饭》，梅雨时期作《梅雨》，五月作《顾正红之死》，同年冬季作《姊妹》；一九三二年作《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战友》；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先后写了《雪中的行商》、《旱灾》、《暗转》、《初雪之夜》、《黎明之前》、《洪水》（独幕剧）、《水银灯下》和《回春之曲》等；他的《晚会》、《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和《洪水》（独幕两场剧）都是一九三六年的作品。他的许多剧作曾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行^②，但他始终以笔为武器，坚持战斗。在一九三一年到抗日战争前的这些剧本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强烈的爱

① 《田汉剧作选》后记，五〇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② 据现代书局所出版的《田汉戏曲集》的附言所载：《姊妹》、《年夜饭》、《梅雨》、《战友》、《顾正红之死》、《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午饭之前》、《一致》、《林冲》、《Piano 之鬼》和《火的跳舞》等，都被禁止发行。

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中起了有力的鼓动作用。

，《年夜饭》描写一个公司职员因失业而决心和工人一起向资本家作斗争的故事。姚秀三是上海某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家，生活并不富裕，时常出入跑狗场和赌场中，希望发一笔财来解决经济困难。一九三〇年底，世界经济恐慌日益深刻化，上海的工商业受到影响，职工普遍失业。姚秀三正在家里吃年夜饭时，切烟间工人谢阿根来请他画壁报上的插画，支援失业工人向资

本家的斗争。失业时失业白己且八司因站高勿即且 下任途加下

裁减职工。谢阿根就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资本家的阴谋，他这样说：“有了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帝国主义的竞争压迫，当然不单是香烟生意，什么生意也做不起来的。可憎的是中国资本家甘心去帮助军阀，去投降帝国主义，受了损失只晓得拚命向我们工人身上进攻，所以我们不干。我们不能原谅他。”他还对姚秀三说：“你不过比我们多拿几十块钱，在地位上也还是一个职工，这样替资本家说话，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作者在思想转变后的第一篇剧本，比较过去同样描写工人年关斗争的《午饭之前》中所揭露的阶级矛盾更为深广，因而也较有魄力，初期作品中的颓废和感伤，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还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作品。关于姚秀三在转变以前的所谓“小职员生活”，由于作者“接触得比较紧密”^①，写得比较生动，至于他的转变，却写得不很自然。象他这样觉悟不高的人，第一次遭遇到失业的威胁，不大可能拒绝朋友给他介绍的每月可得一百二十元薪水的新的工作，而他的那位习惯于市民生活的妻子也不会就让他去参加年关斗争。他接到了公司里送来的信，先不拆开，一直等到谢阿根来谈起外边传闻他已被公司辞退之后方才拆开来看，这也未免不近情理。剧本结尾虽然很有气势，但还夹杂一些狂热的幻想成份。此外，杨先生的被捕入狱以及电车工人的斗争，都只是片段的叙述，和主要情节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加强主题思想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真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天灾人祸使得多少劳动人民无法生存。“那年那连绵的‘梅雨’也就是那弥漫十六省的大水灾的开端，在这梅雨期中多少‘小民’宛转挣扎在生死线上。当时（报载在上海）法租界南阳桥有做小生意的潘某，因天雨赔本不能按日付印子钱而自杀”，这段新闻后来就成为田汉的《梅

① 《田汉戏曲集》第一集，《自序》，五页，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雨》的“蓝本”^①。田汉选择这个悲惨的故事作为题材，并根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典型化，不仅深刻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方向和光明的前途，这就使得这一社会悲剧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战斗精神。

潘顺华在乡下不能过活，就到上海来做工，后因年老被厂方开除，只得做小生意度日。他的妻子徐氏和女儿阿巧都在纱厂当女工，阿巧因为手指被机器轧断而失业。梅雨期间，潘顺华不能出去做小生意，欠了许多印子钱和房租，自己又生了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阿巧的未婚夫文阿毛本来是机器工人，因左臂轧断也被厂方辞退，他没有认清斗争的方向，竟向某资本家的儿子写恐吓信借钱，结果反被巡捕抓去。潘顺华不堪债主和房东的催索，又看到文阿毛的不幸遭遇，就拿出刀来自杀了。他的妻子这一天正在厂里和资方作斗争，现在胜利归来，而阿巧也引着工人运动领袖张先生和许多工人随后赶到，大家就给临死的潘顺华指出光明已经在望，他“模糊地但有力地”喊了两声“晴天快到了”之后，带着“微笑”倒下去。

在《梅雨》中，田汉首先从侧面和正面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工厂里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任意开除年老的和受伤的工人。阿巧谈到资本家的冷酷无情时，对他父亲这样说：“真是，你看我们都是拚命地给他们干活，等到你老了，阿毛坏了左手，我轧断了手指头了，就好象熬过了的油渣似的，都给扔掉不要了。”她还谈到工头任意侮辱女工的事。资本家和走狗们虽然并未登场，但是我们从潘顺华和文阿毛的悲惨命运中，已可看出他们的凶恶的面目。在剧中露面的资产阶级分子，有放印子钱的张开富和二房东太太。张开富

^① 《田汉戏曲集》第一集，《自序》，六页，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真是一个吸血鬼，他借出一块钱每天就得收四个铜元的利息，他看到潘顺华付不出本利，竟劝他将女儿“押给什么堂子里”。二房东太太表面上很和善，实际上却杀人不见血，她知道潘顺华付不出房钱，假装说是自己要住，劝他第二天就搬出去。剧本在这里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狠毒和虚伪。

《梅雨》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本质，而且还在于明确地指出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的出路。田汉描写了剧中人所走的三条不同的道路，指出其中只有一条才是正确的道路。潘顺华忠厚善良，但是受旧思想的影响，相信命运，因而缺乏斗争精神，走的是一条消极的路，结果只得自杀。文阿毛虽然有斗争性，却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错误思想，采取写恐吓信和绑票一类的个人报复手段，走的是一条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结果反被逮捕。这两个人的不幸遭遇，虽然值得我们同情，但是他们所走的路，显然都不是正路。工人只有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找到出路，这是田汉通过几个被压迫的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新的主题思想。

田汉在《梅雨》中塑造了张先生、阿巧和她母亲潘徐氏三个新的人物。张先生是个革命干部，她体现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她本来不是工人，却自愿到厂里来教工人读书。正象阿巧所说，“她爱我们，她教导我们，她和我们一道受苦，一道斗争。”她通过潘徐氏将革命书籍给阿巧看，教导阿巧“现在不是保存一两个人的时候，大家得紧紧地团结起来才有活路。”在她的教育和启发之下，身受剥削和压迫的阿巧提高了阶级觉悟，因而加强了斗争精神。她反对她父亲的命运观念和消极态度，她说：“假使命运象爸爸说的是一块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我们就得掀翻这块石头。不过这块石头沉得很，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气力翻得转来的，所以得团结大伙儿的力量。”她也反对她爱

人的个人报复主义，她说：“毛哥就错在只看见一两个人，看不见大伙儿，只晓得恨个别的资本家，不晓得资本家就没有一个不剥削我们的”。等到后来文阿毛因为写恐吓信而被捕的时候，她很痛苦地说：“他想有了一千块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吗？他真蠢极了，一点也不晓得我们要自由另外有很好的道儿，偏要去信那些流氓的话。”潘徐氏在厂里当工人代表，和资方作斗争，罢工一天就取得了胜利，“工钱也答应加了，俞根生那个畜生也被我们撵走了。”田汉描写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给这个悲惨的故事带来了希望的光芒。

.....

《梅雨》不仅以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吸引我们，而且情节紧张动人，结构简明严谨，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开幕之后，我们看到潘顺华卧病在床，劝阿巧出去卖糖果；作者在这里很简练地说明了这一家的生活状况和人物关系。阿巧冒雨出去之后，文阿毛来谈起有人可以借钱给他。潘顺华交给他从汉口来的一封信，一位朋友介绍他到兵工厂去工作，他决定要带阿巧一同到汉口去。田汉在这一场戏中，除了继续描写失业工人的痛苦生活之外，以潘顺华的“老实”的性格来对照文阿毛的有些“不大老实”的偏激心情，并且给文阿毛向朋友“借钱”这段情节透露了一些消息，为以后的发展安下了伏线。而文阿毛对阿巧的爱情，想“做一个好人”的愿望，夫妇两人同到汉口去工作的想法，引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因而当后来我们看见他的不幸的结局时，格外感到激动。田汉对人物有强烈的爱憎，因而善于从感情上打动观众，这便是一个好例子。在描写潘顺华的忠厚老实的性格和他的贫苦生活之后，田汉就让张开富和二房东太太先后登场，使得观众亲眼看到资产阶级怎样的剥削人压迫人，逼得潘顺华简直无路可走。张开富和二房东太太“好象约好

了似的”，都劝潘顺华从女儿身上“打主意”，这是对于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的很深刻的揭露。正当毫无办法的潘顺华盼望文阿毛借钱回来给他解决困难的时候，包探和巡捕押着文阿毛上场，在潘顺华因绝望而自杀时，最后又出现预示光明的场面，而这些安排都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

田汉在《梅雨》中仅从侧面来表现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而在《顾正红之死》中他就从正面来描写这一个斗争了。他描写日华纱厂的许多工人，不怕厂警的威胁和镇压，群集在事务室门前，一面打听工人代表和日本大班交涉的消息，一面控诉“东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顾正红很勇敢地站出来对工人兄弟宣传，要大家组织起来作斗争，工人是“有组织的一个阶级”，而且“全上海的工人，全中国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是我们的帮手”，“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最初的国家苏联，苏联的工人是我们最大的帮手”，所以斗争一定可以得到胜利。群众听了，情绪十分激昂。工贼李阿根出来劝大家回车间去，工人不答应。日本大班出来骂顾正红是“过激党”，叫厂警逮捕他；工人群众上前抢救，大班拿出手枪打死顾正红，马上逃走。最后群众怒吼，“打死李阿根那汉奸！”“不要走了凶手！”田汉在这篇剧本中表现顾正红和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颇有魄力，可惜只写了第一场就搁笔了，因此我们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

描写工人斗争的剧本，还有《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上海外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实行罢工，停止开车。外国资本家一面逮捕罢工工人，一面另雇新工人来继续开车。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王茂林组织大家继续斗争。他的内弟林德润事先不了解情况，进公司做售票员，后来不愿忍受公司里的白俄查票员的打骂，随着许多新工人一起罢工。中秋节的傍晚，林德润到王茂林家里来。王茂林最初误

会他是“阶级敌人”，不愿理他，后来听说他已参加罢工，就很高兴地称他做“同志”。另外有一个罢工工人张国良也来过节，谈起他正在动员新工人中的山东同乡参加罢工。王茂林向他指出：“别停留在同乡关系上面”，还要有整体观念，“不管是哪一省，哪一块地方的工人都是属于一个阶级。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他主张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张国良曾经殴打过甘愿做走狗的司机阿金，现在正有包探和巡捕到王茂林家里来捉他。王茂林为着保存斗争的实力，就带着林德润和张国良从后门出走。等到包探和巡捕进来，只见王茂林的妻子在喂孩子，只得“轻轻退去”。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中表现工人的坚决的斗争的意志和明确的斗争路线，尤其是指出了工人要有整体观念，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比较现实的处理……题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这篇剧本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如矛盾冲突没有充分展开，几个片段情节缺乏更有机的联系，以及结尾的“幽静”气氛和全剧不调和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田汉在描写工人生活时，由于生活的不熟悉，还不能得心应手，但是，这篇作品标志着田汉思想上的新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从《午饭之前》到《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这些描写工人生活斗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饱满的政治热情。他关心工人的痛苦生活，歌颂他们的革命斗争，他还在《梅雨》中表达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胜信心。这是田汉创作上的新发展，也是戏剧文学中的新收获。在这些作品中，《梅雨》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剧本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还有“不够，不熟练”的地方，例如人物概念化，缺乏性格，“用语不象工人的话，象知识分子的话”等。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作者的生活经验问题。田汉后来论及《一九三二年

的月光曲》时，曾经这样说：“老守在小资产者的生活的环境中，不能坚决地投向劳苦大众中去，亲近大众的生活，是不能写出大众所需要的作品的。”①我们从他的这一句话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创作情况，同时也可看到一个革命作家总是不断地在向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

《乱钟》作于一九三二年初，描写“九一八”晚上，东北大学的学生听说日军进攻皇姑屯和北大营时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其中还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的反动实质。晚上，一群大学生正在宿舍里进行各人的活动：有人朗诵《汉姆雷特》中的著名独白，有人低吟李后主的词，有人写情书，有人拉胡琴、唱京戏，有人（学生乙，叶仲群）写文章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自一九二九年未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两年以来，有加无已，……帝国主义者为了逃脱危机，一面加强反动统治，压迫剥削本国人民，一面想挑起分割殖民地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四省夙具野心……”田汉通过这些大学生的谈话，告诉我们当时南方各省大水为患，民不聊生，北方的资本家受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转而加紧剥削工人，结果引起工人的罢工运动。在这一群大学生中，学生乙叶仲群显然是一个革命青年。他批判了学生丙的父亲（一位资本家）“依靠政府警察，甚至在安东的日本特务，来抓工人领袖，镇压罢工”的错误，主张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那时沈阳的形势已很紧张，日军常在街头演习，女学生小黄还拿出她所偷拍的照片来，证明“日本兵在路上打我们老百姓，战车冲进老百姓屋子里，还用刀背砍我们小学生”。正当有些学生要出去看电影的时候，学生甲接到了父

① 《田汉戏曲集》第二集，《自序》，一四页，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亲的电话，告诉大家日本关东军已向省政府提出条件，恐怕将有行动。大家就很热烈地谈论着参加游击队，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接着学生代表从省政府请愿回来说，当局不肯发枪给学生，劝学生埋头读书，不得干预国事。叶仲群便号召大家说：“政府不打算抵抗侵略，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就只有一条路，赶快来自救，坚决参加伟大的民族革命。”一个汉奸学生拿出手枪来威胁叶仲群，结果反被许多学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日军炸毁皇姑屯的铁路，发出“轰然一声”。有些学生主张再去请愿成立“学生救国军”，叶仲群主张敲起校钟，集合全体同学行动起来。一个学生回来报告，日军已向北大营进攻，当局采取“不抵抗主义”，禁止官兵还击。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慨。叶仲群就向大家指出，“同学们，现在咱们的梦该醒了吧，政府已经把我们东北国土，双手献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了，把我们的人民交给鬼子，供他们奴役践踏。同学们，现在只能靠我们团结来自救了，只要我们真能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全世界进步人民会支持我们的。”他主张到兵工厂里去拿枪械，并叫大家到操场上去集合。同学们就行动起来，枪炮声和乱钟声闹成一片。最后，叶仲群向大家狂叫：“快些起来，紧急集合啊，快些和工人、劳动人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再不起来，到了明天，沈阳就是鬼子的沈阳了，全中国也要变成鬼子的殖民地了。快些起来挣扎我们的明天！快些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是一篇充满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热情的剧本，具有强大的鼓动作用。田汉在这篇作品中，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同时又对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胜利前途作了热烈的歌颂。这是一篇群众剧，写得很有气魄。他在开始

时生动地描写了大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的各种生活，真实的表现了他们的不同思想，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应该参加反帝的斗争。剧中除了那个汉奸学生之外，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敌我斗争，但是由于作者巧妙而有效地从侧面来表现敌人的侵略活动和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所以主要的矛盾冲突就逐步地向前发展。随着敌人的进攻一步步的加紧，学生们的热情一步步的高涨；他们在叶仲群的领导下，思想一步步的明确，行动一步步的积极，终而形成了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一股洪流。这里写的虽然只是青年学生的动态，但是可以作为广大人民的缩影来看。善于描写群众的热情和气势，这是田汉在《乱钟》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特色。

这篇剧本的宣传鼓动作用是很大的，曾经动员许多爱国青年去参加抗日战争。“在1932年1月28日晚上剧联的中心剧团‘大道剧社’在郊区某大学(暨南大学)公演《乱钟》，戏演至末尾，剧中日兵占领沈阳的炮声唤起了大学生们在操场集合要拿枪抗日的时候，日本进攻上海的真正炮声也响了。演员们立刻号召观众们到操场集合，宣誓参加抗日工作。他们后来果真忠实地执行了诺言；许多演员们、学生们去参加了前后方的工作。”①

日军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下午，又攻破长春附近南岭兵营。长春爱国学生向市民和工人宣传抗日，竟被警察逮捕，群众起来反抗，有两人被打死。日军进城，警察局长奉命解除警察武装，日本军官命令警察下跪，有些不肯下跪的警察都被扫射而死。日本军官强迫当地人民撕毁反日标语贴上日军布告，许多爱国人民都不屈而死。一队中国士兵赶到，群众拿起警察所缴枪械，配合中国军队将敌人歼灭。这时附近又发出枪炮声，于

① 张庚：《半个世纪的战斗经历》，《戏剧论丛》，一九五七年第三辑，一三页。

是中国军民合作，前去迎击敌人。这便是田汉继《乱钟》之后所写的《扫射》的主要情节。

田汉在这篇作品中描写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揭露日本军队的凶暴残酷以及反动统治的压迫人民投降敌人的丑恶面目，并且还指出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胜利前途。他着重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巨大力量。日本军官强迫一位老人去撕掉抗日标语，老人坚决拒绝，对大家说：“各位同胞，我赵老大年纪老了，不成了，但我不愿意活着做亡国奴。各位同胞，你们年轻力壮的快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军打死了那老人之后，又叫一个小孩去贴日军告示。小孩将那告示撕得粉碎，向日军掷去。日本军官下令将小孩刺死，又拉出一个女子去贴。她抱着必死的决心，喊着“我的丈夫刚给统治阶级的枪弹打死了，我现在又要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枪弹刺刀底下了”，就很英勇地牺牲了。一个中国士兵向群众指出“我们只有向敌人拚命，才可以救我们自己”。他又控诉了日军的罪行，“他们今天上午四五点钟就来包围我们南岭炮兵营，上官命令我们不许抵抗，把枪械交给他们，但是缴了械随即被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可恨他们还把我们一百多个负了伤的弟兄抬去活埋了。”他还号召大家，“我们赶快唤起广大的劳苦大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卖国政府！”最后，英勇的群众随着军队一齐前进了！这篇作品虽然写得不够细致，但热情却是很饱满的。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和反日运动。田汉的一幕三场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以组织“中国女作家抗日救国联盟”为线索，描写了资产阶级女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不同的思想和活动，并且暗示出上海工人学生和革命群众的反日斗争。第一场以公

寓为背景，介绍了三个进步的女作家。黄蔷正从恋爱的幻梦中觉醒过来，决心要和劳苦大众一起从斗争中去寻找幸福。蒋珂的爱人是一个革命家，不幸被害，她正从感伤中摆脱出来，努力去做他所遗留的革命工作。张绿痕刚从沈阳逃到上海，她憎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永远忘不掉她的学生被杀的惨状，因此决心要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陈湘灵托人带信来要发起“中国女作家抗日救国联盟”，她们决定第二天去参加会议。田汉在第二场中，描写七位女作家和其他一些人在咖啡店里开会的情形。张绿痕主张“大家起来领导民众，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歌颂母爱的谢玉波反对她的意见，认为那是“用仇视来对待仇视”，因此主张“只有爱才能抵抗强权，只有爱才能救中国。”苏玛丽宣传“人类的心”，主张“对日本宣战”，以维持“人类的爱和正义”。凌云也主张对日本宣战，“可不是为着人类的爱和正义，而是为着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主席陈湘灵同意她们的意见，但是提出中国的力量问题。谢玉波认为“平常对中国表示好意的美国也一定会拿实力来援助我们的”，凌云认为其他帝国主义者定会干涉日本，中国反而“可以免被瓜分”。黄蔷批判了她们的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指出“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她强调说，“我们的目的不是维持爱和正义，也不是维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是一切的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蒋珂根据咖啡店主人的报告，宣布一个“紧急的消息”：日本侨民六千多人“示威游行”，打击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撕毁反日标语，甚至“乱打我们民众”。她主张“我们要立刻去唤醒广大的群众来自卫，用示威来回答他们的示威！……我们快到街上去号召群众去示威去！”她和张绿痕、黄蔷三人很勇敢地冲了出去，其余的太太小姐以及绅士都作鸟兽散了。第三场描写她们在凌云家里继续

召开会议。陈湘灵、苏玛丽和谢玉波都托故没有出席，只有蒋珂、张绿痕和黄蔷先后来到了。一向追求黄蔷而沉醉在爱情的幻梦中的李心南，赶来告诉她们街上正有一个“了不得的盛会”：先有“好几十个学生对群众演讲我们应该怎样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三省”，后来受到日本巡捕和海军陆战队的压迫和殴打，结果群情激愤，起来向日本人斗争，“连那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坦克车，虽然如临大敌在马路冲来冲去，但在那样狂烈的群众面前也无可如何。”他说：“快跑到群众里面去吧，那才是真正的力量！”蒋、黄、张三人很兴奋地冲出去，剩下凌云，她居然有闲情逸致陪朋友打小高尔夫球去。

田汉在这剧中用阶级观点分析并批判了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她们中间，有人在唯心主义思想的伪装之下，有人露骨地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的态度，甚至还想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漠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严重灾难和伟大力量，因而当广大人民起来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就相率退却。这些人在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民族的命运，正如李心南批评凌云的那样，“你们躲在这样的洋房中间，亡了国也不会晓得的。”田汉对于资产阶级的揭露和批评，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他通过三个革命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在基本上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的方向，虽然她们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的成分。……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突出主要的矛盾冲突，人物缺乏鲜明的性格，对话都变成了演说。田汉通过“女作家抗日救国联盟”的会议来表现不同阶级的女作家的思想分歧，但他没有将这个矛盾和中日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的反日斗争更有机地交织起来，使性格和情节从这交织的纠葛中得到发展，使冲突逐步推向高潮。因此我们只听到剧中人在大

发议论，而看不见戏剧动作的进行。每个人物只是“代表”某种“意见”出来“演说”，因而缺乏性格，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每人的“演说”都很冗长。……

田汉的《战友》便是通过大学生沈孟嘉的故事来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并表现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的作品。

沈孟嘉在“一二八”参加义勇军作战时眼睛受了伤，现在住在医院休养。他本来和一个女同学恋爱，但是自从瞎眼以后，她又和汉奸同学相好，并且在停战协定签字这一天，在医院对面的教堂里举行婚礼。沈孟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激，要跳楼自杀。在“一二八”战争中断了手的士兵老刘挽救了他，并劝告他应该为民族牺牲而不应该为女人牺牲。这时窗外传来几千工人和学生为反对停战协定签字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的声音。沈孟嘉和老刘也很兴奋地喊着口号，压倒了对面教堂里正在举行婚礼的声音。

当沈孟嘉听到街上报童叫卖反动政府“签订美国条约”的新闻时，就很悲惨地说，“反正我们大家是白牺牲了。我的眼睛是白瞎了，老刘的手也是白断了，我们做定了奴隶了。”看护叶同志讽刺反动政府借“忍痛”两字来掩饰投降的实质，“前些日子都说得那么好听的，这会儿用着‘忍痛’两个字什么都做不出来？军官们‘忍痛撤兵’，外交官们‘忍痛签字’，商人们‘忍痛开市’，……好象什么事都没有了似的”。

沈孟嘉最初经受不起这种打击，而“不识字”的老刘就比他坚强得多。他劝大学生“一心一意养好身体和敌人拚去”，“瞎了眼睛，你还有手啊！我呢？我是只剩一只手，一只手我就饶了我们的敌人吗？不，就是这一只手也没有，我也不饶的。我还有口啊，我还有牙齿，我咬也要咬死他们的！”

田汉在《战友》中过分着重地描写了沈孟嘉的恋爱心理，没有更集中地来揭露反动统治者投降妥协的罪恶，因而就使这篇剧本缺乏思想深度。

《初雪之夜》描写上海一群失业者在初雪之夜露宿街头，忽遇敌人进攻，于是群起抗战的情形。剧中有失业工人、失业文人、小偷、沿街卖唱的音乐家，关外逃来的难民，还有银行家和他的朋友。田汉在这里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资本家的残酷腐朽，表现了失业者的友爱互助和抗日决心。但是这篇剧本缺乏情节和性格，不能说是一篇成功的作品。

《黎明之前》系由多幕剧《出走后的娜拉》改成的独幕剧，其中描写一个顽固的母亲反对子女离开她去参加抗日斗争，就用毒药自杀并毒死子女的悲惨故事。她的女儿士玉和儿子士锐都是爱国青年，热心抗日救国工作。士玉发现她的丈夫是个汉奸，便断然和他脱离夫妻关系回到娘家。士锐参加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准备到关外去当义勇军。可是那位顽固落后的母亲，遵守着她丈夫的遗训，希望子女“都象她那样，不要说一句过分的话，不要做一件越轨的事”。当她看到她已无法阻止子女的爱国行动，无法叫他们安分守己的留在家里，而她又“怎样也舍不得他们”，于是就想出同归于尽的毒计。她早就将电话线剪断，将门锁上，使得子女发觉中毒而无法求援，终究逃不脱死亡的悲惨命运。

田汉描写子女中毒后的惨状，强烈地激起了观众和读者的同情。田汉写这篇剧本时，可能有所隐射，那个顽固的母亲可以作为当时封建势力的代表。但是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大举侵略华北的时候，国内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爱国人民和卖国政府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而田汉却只描写由于那个母亲的封建思想而酿成的惨剧，从戏剧的效果上来看，这就缺乏更深广的